无名的共同体：“难民”作家的伦理选择

Communitying Literature: On the Ethical Choice of “Refugee” Writers in *The Displaced*

李 昀 (Li Yun) 周娉娈 (Zhou Pingdi)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研究了《流离失所》中“难民”作家的伦理选择如何改写了文学本身的伦理性。书中18位时居欧美的移民作家，面对2016年前后西方政治的右转，自我去名，对欧美意识形态去认同，从“难民”位置上展开书写，从而改写了文学的定义，把书写者、书写方式和书写目的共同体化了：他们超越西方意识形态召唤的主体-他者界限，与他者融为一体，因而具有了与他人通感共情的能力，在感同身受中展开共同体化的书写，并且书写开门迎客、天下一家的共同体伦理。

关键词：《流离失所》；文学伦理学批评；难民文学；共同体

作者简介：李昀，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文化批评；周娉娈，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实观照下国际难民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研究”【项目批号：19BWW088】阶段性成果。

Title: Communitying Literature: On the Ethical Choice of “Refugee” Writers in *The Displaced*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how the ethical choice of the authors in *The Displaced* refines literature. Facing the post-2016 risk of being deidentified, these 18 immigrant writers then living in Euro-America address themselves as “refugees”, dis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western ideology, and thus communitying literature through communitying its writer, its writing, and its objective. In dispossessing western ideology, “refugee” authors transcend the Subject-Other division established by western ideology, communitying with the refugees under their pen. In this way, they speak as and for global refugees, visioning a harmonious human community in which people live together in friendship and love rather than separation and hatred.

Keywords: *The Displace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fugee literature; community

Authors: Li Yu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ffly@scut.edu.cn). Zhou Pingd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pdzhou@scut.edu.cn).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研究作家创作，让我们发现《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 2018）中作家们的伦理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伦理性。书中，18位欧美移民作家纷纷自称“难民”，对欧美意识形态去认同，回应2016年前后欧美意识形态右转激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非虚构写作中回忆自己早年的难民经历，以及当下人人自危的感受，表明作家只有“再度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摒弃西方意识形态召唤的主体-他者界限，才能展开“文学”书写。此举把文学包括书写者、书写方式和书写目的共同体化了：作家们去西方意识形态占有，成为与他人一体的共同体书写者，因此具有了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在通感和共情中书写开门迎客、天下一家、万邦和谐的共同体记忆。

—

聂珍钊在倡导文学伦理学批评时指出，“伦理价值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13），应该“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1），包括研究作家创作及作家与创作的关系，如作家创作与现实社会中伦理道德的关系，作家的伦理道德立场及其产生的原因、时代背景、形成过程、对创作的影响等（“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19）。从这个角度看去，《流离失所》中，西方意识形态波动导致的难民-移民们对西方伦理政治制度的失望，让作家们选择成为“难民”书写者，从而改变了文学本身的伦理性。

书中作家们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对欧美意识形态的去认同，因为后者开始对他们去召唤，让他们在国族和意识形态认同上再度难民。关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认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个体召唤为主体，接受召唤的是好主体，不接受的是坏主体，会被国家机器镇压。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都是由意识形态召唤决定的，被召唤为主体的结为共同体，与此共同体外的人群对立，主体-他者的对立。沿着此话题，佩苏（Michel Pêcheux）作了进一步区分，辨析出三种情况：（1）认同（identification），好主体接受意识形态召唤；（2）反认同（counter-identification），坏主体反对主导意识形态提供的认同方式和形象；（3）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抵抗召唤本身，从“非主体的位置”反作用于主导意识形态，从内部改变其文化逻辑，发展出新的政治或书写形式。

佩苏的分析虽然没有跳出召唤-认同的基本框架，却暗示了超越此模式的可能性，个体不仅可以从反对的立场批判主导意识形态，还可以摆脱召唤-认同模式，在西方意识形态之外书写，这便是“难民”书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难民们去召唤，让他们从自身系统中消失，或者不召唤他们，不给予他们任何权利，不以任何形式把他们纳入自身系统，让他们在其中没有任何位置，完全无身份，只剩下生物性存在。但对于“难民”作家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超越召唤-接受的辩证关系，超越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外书写，进而书写新的人类关系。

这便是《流离失所》中作家们的伦理选择：他们自我难民，早已是合法移民，却自称难民，宣告了对欧美意识形态的去认同。从难民到移民到再度难民，他们经历了一系列认同变化。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们用“名”来翻译 *identification* 一词，命名即意识形态召唤，权威机构对个体在社会制度体系中身份和位置的规定，被命名的被纳入其中，不被命名的则被排除在外。难民-移民们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命名的 (*identified*) 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召唤并接受召唤；无名的 (*non-identificatory*) 未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召唤，或者自我放逐于意识形态认同之外；除名的 (*deidentified*) 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去召唤，剥夺成为公民-主体的权利；去名的 (*disidentified*) 不接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召唤，放弃对主导意识形态甚至召唤本身的认同。其中命名的还有一个变体，误名的 (*misidentified*)，即个体误以为找到了可以皈依的身份，却发现自己认同的意识形态根本没有接受自己，承认自己为主体。

《流离失所》展示了一个难民的基本经历：他拒绝了流出国意识形态召唤，进入流入国，却很难被他希望寻求庇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接受，成为主体，而是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终生都无法得到承认。即便暂时被容纳，也会因为意识形态波动再度被否定、拒绝或排斥，剥夺先前的命名，陷入无名状态。这种剥夺可能是实际的，被遣返，也可能是想象的，虽然国家机器没有强制排除其生物存在，意识形态的排斥却让他感受到了歧视、威胁和剥夺，让他意识到自己先前对该国意识形态的认同其实是虚幻的，他的自我命名从未得到承认。这种觉醒会导致他对该国意识形态的去认同或者去占有 (*dispossessed*; Butler and Athanasiou)，丧失认同对象，进而丧失可以依仗的 (想象的) 身份。所以 *The Displaced* 这一标题包含着三重含义：(1) 被意识形态错置 (*displaced*)，放在了错误的位置；(2) 被意识形态去置 (*displaced*)，失去原有位置 (*dis-located*)；(3) 自我去置 (*self-dis-placed*)，把自己拔出意识形态召唤的 (错误) 位置。

书中，作家们选择了自我去置，取消先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误认，自我去名为无名者：“以前，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难民。在我的意识中，我是移民(……)难民似乎是过去的事(……)只是近年来我才开始自称难民”(Vu Tran, “Refugee

Again” 142) ¹。这段话概括了 2016 年前后欧美难民-移民们经历自我认知变化。这些早年有过难民经历，早已在欧美获得合法居住权，跻身中产阶级的作家，开始自称“难民”，意识到自己从未被现居国接受，先前对其的认同以及因此获得的自我命名只是一种错觉，这种觉醒让他们开始自我去名，与欧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带来新身份认知的，是欧美意识形态的变化。恍惚间，西方政治已经极速右转，墙已建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取代了曾经看似温和的歧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更是推升了对难民-移民的敌意，难民恐惧症、移民威胁论空前兴起，变得明目张胆、堂而皇之：伊斯兰妇女在公交上受辱，小学生在教室里敲着桌子狂喊“脱欧！脱欧！”还有人冲到疑似外国人面前高喊“我们投票让你滚回去！现在滚！”大众媒体“说着粗俗暴力的语言”，叫嚣着要严惩反对脱欧和特朗普的“国贼”（Marina Lewycka, “Refugees and Exiles” 118）。这些变化让难民-移民们恐慌，感到了被除名的威胁：“我是穆斯林，难民，同性恋。特朗普的完美目标”（Aleksandar Hemon, “God’s Fate” 94）。“特朗普成为总统，你的国家也上了六个‘穆斯林禁令’国名单。你突然就成了穆斯林。突然无人再怀疑你是棕色的”（Porochista Khapour, “13 Ways of Being an Immigrant” 111）。他们还意识到风险不是暂时的，两大事件“不会局限于自己的历史时空”（Lewycka 117），而是会影响我和儿孙全部余生生活。

这种认知刺破了曾经的身份幻觉。他们曾自以为早已被欧美接纳，给予稳定的身份，让他们可以在此“舒适地定居”，对这个国度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热爱其“语言微妙狡黠的光华”（118），为自己说着这种语言而骄傲。这种误名曾让他们自视为新世界的移民，得到召唤，不再是难民。后者只是“土耳其和利比亚海边从漏水的小船上仓惶跳下的母亲和孩子，或者被冲到地中海海滩上已经悄无声息的年轻身体，很悲伤，却与我无关”（113）。然而，现实刺破了这个玫瑰色的梦，欧美早已成为社会阶级和代际分裂的国度，我却“注定要在一个面目全非的国度度过余生”（118）。梦的破碎始于意识形态对其的排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肤色、样貌、习性、信仰等再度引人注意为人忌惮时，就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被那个曾经口称欢迎你的国度接受：“现在我有了一个女儿，已经看得出是伊朗裔了。她人生第一大事件是脱欧。第二是特朗普当选。脱欧那天早上五点，我正在给她喂奶，我的粉色头纱记忆又回来了。”他们本以为已经挺过了初来时的特殊待遇，现在却发现自己从未也无法摆脱“难民”状态，随时可能被除名：欧美“不想要我”（Dina Nayeri, “The Ungrateful Refugee” 138-139）。

1 本文有关《流离失所》的引文均来自 Viet Thanh Nguyen, *Nothing Ever D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二

这种认知带来了对其去认同，除名风险带来的自我去名。除名风险带来的再度失家的感觉，甚至超过了逃离时的惊惶无助。彼时，他们内心是有认同的，被流入国接纳的微弱幻想，维持着他们出走后的最后一丝认同，支撑着他们的存在。然而现在，这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他们陷入彻底的认同缺乏，开始自我去名，在情感和认识上自我放逐，疏远曾经接受的意识形态，自认为“难民”，身处欧美，却无以为家，不再将其视为向往之地，因为“我们是且始终是外人”（Lewycka 118）。他们发现自己先前的认同不过是一种误认，错误地认识了欧美意识形态，也错误地想象了自己的被接纳。

幻想破灭，便是取消误名的开始。他们意识到自己曾经是难民，现在则是手持绿卡的“难民”，无法得到承认，便取消先前的误名：“那个我们引以为家的国，只是孩提时代玫瑰色的田园，永远把我们放逐在外”（119）。这是对欧美意识形态的批判，更是对先前误认的取消，承认那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梦，如今的梦醒就是对先前认同的去认同。他们甚至承认，内心的怀疑从进入这个国度就开始了，日积月累成了今日的弃绝。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受欢迎，身份审查不是为了接受他们，而是为了排除和否定他们：

“一切开始于你身份的逐渐褪去，姓名和头衔让位给数字和文件。你成为一张要盖章的签证，一双隔离区医生要检查的瞳孔，让火车超载的55公斤；往坏了说是一种病毒，往好了说是一颗不断转化的尘埃（……）这是主体与纯粹对象之间细微残酷的区别”（Lev Golinkin, “Guests of the Holy Roman Empress Maria Theresa” 62）。

这造成了他们与认同对象之间的隔阂，破坏着他们的认同想象，直至耗尽最初的幻想：成为难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断剥夺他们可以用于自我命名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安身立命的锚，把他们变成“无根无系的幽灵，需要新的生活”，却永远也找不到停泊之所。这不仅仅是被排斥，更是除名风险带来的心理上的自我偏离，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没有可以回去的家，也没有要找的地址”（61-62）。除名的风险和想象，让他们不断远离对欧美心理、情感和认识上的接受，“风化”了重新命名的希望，学会“小心”西方人（62）。这条想象的界限，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自己不可挽回地成了难民”（61）。

这是对认同-归化的怀疑，质疑召唤和认同本身的价值，包括认同对象、过程和结果的意义。作家们首先质疑了认同结果，怀疑承认和接受的意义：即便得到承认，也可能充满荒诞，带来的不是归属感而是歧视，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和应得的。比如一位伊朗裔移民女性，经历了童年买不起布娃娃的阶段，努力学习和成长，成为纽约的大学生，却始终无法融入同学圈。在英国交换时，她终于被英国同学指认为“美国人”，却是因为吸毒、酗酒、滥

交，一次次被强奸却保持沉默。她通过写作在社会上立足，最终也只是被承认为意味深长的“伊朗裔美国作家。”所以，当拿到绿卡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美国人时，她感到的不是得到承认的欣慰，而是对承认的怀疑：这种承认承认了她的“归化”，她却在归化中失去一切，无家可归：你“在这个国家无根无底，没有任何理由呆在这里，”呆在“真正的、暴力的、从未保护你的美国”（Khapour 111）。

这是承认的暴力：无法带来归属感的承认毫无意义。这让难民-移民们对归途惶惑不安：“你想着自己是否生是美国人死是美国鬼（……）意识到你将死为美国鬼，你心生欢喜（……）痛苦不堪（……）惶惑恐惧”（112）。政治气候的变化让他们感到“你的旧世界回来了”（110），将被迫再次重演对居住国的去认同。他们曾经那么想融入现居国，得到承认，终究不过一场空，让他们意识到曾经的渴望和努力多么荒诞，甚至周围的金发路人都在嘲笑他们，嘲笑他们曾那么想融入，曾寄希望于白人，曾自以为成功。西方的接受和承认带给他们的不是被接纳的幸福，而是要逃离的噩梦，摧毁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也让他们对召唤和认同本身充满怀疑。

整个召唤-认同过程也充满怀疑。流入国召唤他们的归化和服从，却从未带来他们的全心接受，反而制造了各种内心隔阂，因为整个召唤过程满是伪饰和浮夸。难民们从进入移入国开始，就要学习“感恩”，要庆幸自己成了美国人，要随时记得证明“因为认识我，西方变得更好了”（Nayeri 137）。“感恩教育”召唤着他们，要求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接受和服从，承认这个国度远远优于其他地方，而伊朗“男人对女人很粗暴”（132）。难民们却发现自己无法承认“愚蠢的伊朗人”是不能强过美国人的（130），他们更想高喊“我很幸运，我很感激，我在班上最聪明”（130），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聪明，而是一个伊朗裔小孩的聪明。召唤带来了相反的自我命名。

这也通向了对认同对象的怀疑，怀疑“国家”“公民”“边界”等基本西方理念。西方意识形态要求难民们承认逃离国的恶，作家们却在怀疑“何为国？何为公民？我们乡归何处？欠彼此什么？”（Bezogis, “The Common Story” 36-37）正是这些概念导致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信仰与信仰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导致“世界各地无休止的动荡”（Mengiste, “This Is What the Journey Does” 122）；导致在欧美和非洲、中东一样，都会遇到“对我族类的殴打和焚烧”（Tshuma, “New Lands, New Selves” 156）；导致“承诺和希望的破灭，无法忘怀和说出的轻慢和侮辱”；导致难民们四处流浪，无法找到“安全、共同体和家”（Hadero, “To Walk in Their Shoes” 81-82）。

否定了认同的对象、过程和结果，也就否定了认同本身，这是更为根本的自我去名：没有了对认同本身的认同，缺乏带来身份倚仗的认同想象，他们成为彻底的无名者。他们先是失于错置，处于误名和错位中，现在则是自我去置，处于无名和失位中：“流离失所等于错置，被迫离开所属位置，再

无合适位置” (Tshuma 154)。这是自我认同的失根, 失去了心之所属和伦理皈依, 他们成了真正的“难民”。

三

然而, 在作家们看来, 这却是一个机遇, 他们可以籍此超越西方意识形态, 重新定义文学及其伦理性, 从“无家可归”的位置上开展去西方意识形态占有的书写, 促成了文学书写者、书写方式和书写目的的共同体化。首先, 书写者成为共同体: 西方意识形态召唤主体-他者的对立, “难民”作家则因为去西方意识形态占有而克服了我他分界, 主体与他者、书写者与书写对象融为一体, 形成一个无限的共同体。其次, 与他者一体, 书写者也具有了与他人通感、共情的能力, 可以对他人的情感和感受感同身受,¹ 展开我他一体的书写。最后, 他书写的也必然是他我一体、世界一人、天下一家的共同体伦理。

阮清越在《序》(Viet Than Nguyen, “Introduction”)中演示了这种共同体化。他开篇就提到虽然我是移民, 但是“我坚持让人称我难民”(8), 取消了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认同, 也取消了它召唤的主体-他者界限, 把他者带入我这边, 成为“我们”(Viet Than Nguyen, *Nothing Ever Dies* 7): “我”成为与他者一体的共同体, 一个无名的因而也无界限的“我们”。“我”也因此具有了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² 通过感受自身的痛苦来感受他人的痛苦, 在感同身受中书写他人的苦难和脆弱性。

在《序》中, 阮选择了第一人称叙述, 通过讲述自己曾为难民的感受来讲述其他难民的感受。对于他人的经历, 他不是采取客观观察的方式, 从高高在上的作者即上帝视角讲述我对他人的观察, 把他人变成与我分离的书写对象, 而是通过重新感受自己身为难民的感受, 来感受具有相同经历的他人的感受, 我的感受因此与他人的感受融合在一起, 我就在这种感同身受中与他人结为一体。阮在文中用得最多的表达便是“我记得”“我不记得”“我想象”, 回忆自己的难民经历, 但不只是为了回忆、想象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而是在对自身经历和感受的回忆和想象中, 想象和感受其他难民的经历和感受。

阮4岁时于越战后随父母来到美国, 对难民经历所记不多, “对于我不记得的一切, 我满怀感激, 因为我记得的东西已经让我痛不欲生”(10), 但是他说“我必须想象自己曾经经历过什么”(10), 不是为了回忆自己的经历, 而是希望通过重新体验和感受曾经的伤痛, 来体验和感受其他难民的痛楚: “但我确实记得被资助人带来见我父母, 在被带走时大哭大闹。我记得

1 参见李昀: “感同身受的共同体: 论阮清越的大同主义伦理选择”, 《文学跨学科研究》5 (2021): 71-83。

2 参见李昀: “感同身受的共同体: 论阮清越的大同主义伦理选择”, 《文学跨学科研究》5 (2021): 83。

几个月后我重新回到父母身边那雪那冷还有我母亲不知为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不知多久，我只是隐约觉得与她远离故国家人土地安逸以及她自己有关。记起这些，我知道我已经预示了接下来最痛苦的日子，未来几十年她将经历的一切”（10）。“我”努力想象和感受自己曾经的痛，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父母的痛，这种了解不是来自父母的诉说，或者我对其的观察，而是我对自身经历的再感受，在感同身受中想象和体验父母经历的一切。我的感受因此就是他们的感受，我在感受中与他们融为一体。

这是共情的书写，真正意义上的共情，来自对他人苦难和脆弱性的感同身受。阮还把这种共情差序地推向周围越裔社区和全球难民，与他们融为情感、感觉的共同体：“从我所记得和不记得的一切中，我相信自己与叙利亚难民以及六千五百六十万被联合国划为无家可归的人成了亲人”（13）。难民经历让我痛苦，但是我珍视这段经历，它让我可以感受和想象他人的苦难，也让我可以自我去名，成为超越西方意识形态的同情者，与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人深切共情：“我滋养曾为难民的感觉，因为作家必须进入伤痛之处，必须知道身为他者是怎样的感觉。作家无法体验他人的生活，就不会有作品，只有通过记忆、想象和共情等活动，才能培养我们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14）。文学来自共情，需要作者自我去名，成为可以对他人苦难感同身受的“难民”，于共情的书写中与对象结为一体。

这样的共同体—我也必然会书写共存伦理，消解西方意识形态强调的国家界限，想象天下一家、世界一人的全球共同体：“我们应该审视我们现在的国界情况，我们应该想象一个更加正义的世界，其中界限只是文化和身份的标记，有价值却可以轻易跨越，而不是法律界限，被设立来严格我们的国籍身份，让我们时刻准备着冲突和战争，彼此隔阂”（Nguyen, “Introduction” 16）。界限是难民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难民文学的书写必须溶解界限，书写族群与族群、文化与文化、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伦理，愿望睦邻友好、万邦和谐、天下一家的人类社群：“界限的溶解是世界主义的乌托邦愿景，愿望世界和平，愿望无人流离失所的全球场域，愿望人类就是一个全球共同体，允许文化差异，而不是那些导致剥削、惩罚和屠杀的差异。让界限可以穿越，我们彼此相邻，相亲相爱。这种憧憬让我热血沸腾，有人却觉得它莫名恐惧”（16）。

阮还认为这并非什么新话题，相反，历史和文学史中充盈着仁者爱人、守望相助的故事，只是强调国家-界限的西方意识形态遮蔽了这些：“我们曾经那么会爱人，睦邻友好，衣蔽贫弱，食养饥馑，开门迎客。铭记这些，才能梦想一个看重人而非边界的未来，为之奋斗”（16）。“难民”文学要提供仁爱友善、开门迎客的记忆，看重人性而非边界的记忆。这种记忆表明我与他人休戚相关、命运与共，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是因为我们本为一体。因为这种一体性，我可以在自身脆弱性中感受他人的脆弱性，如这些

“难民”作家一样，通过书写自身经历，纪念那些颠沛流离的生命，感受他们的悲喜，揭开西方意识形态对他们的遮蔽，也在对他们的苦难和脆弱性的感受中与全球无家可归者结为一体。

总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流离失所》中的创作，让我们意识到“难民”作家自我去名的伦理选择，改写了文学的伦理责任，也改变了文学本身的伦理性，带来了文学的共同体化，把文学变成了“共同体文学”。

Works Cited

- 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85-126.
- Butler, Judith and Athena Athanasiou. *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 Nguyen, Viet Thanh. *Nothing Ever Dies*. Cambridge: Harvard UP, 2016.
- . ed. *The Displaced: Refugee Writers on Refugee Lives*. New York: Abrams Press, 201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6-24。
- [Nie Zhenzhao. “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New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 16-24.]
- ：“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10（2014）：8-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0 (2014): 8-13.]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
- Pêcheux, Michel.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translated by Harbans Nagp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